

王维舟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优秀的儿子。王维舟同志已经离开我们整整38年了，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其革命历程充满了曲折、艰辛和传奇。谢觉哉同志曾题写贺联相赠：“永是车头不落尘，反清反帝到而今。爱民爱党心如火，名将从来多善人。”这是对王维舟同志一生贴切而生动的赞誉。作为他的同乡，红军时期的战友和部下，我们深深地敬重和怀念这位一生耿耿忠心、为党为军为民奋斗的老领导、老前辈。

（一）

王维舟同志1887年6月10日出生于四川省宣汉县(原东乡县)清溪场。他的祖父曾考取前清“贡生”，在当地颇有些名气，但家境平平。随着祖父母相继去世，家道中落，还在读私塾的少年王维舟不得不辍学务农。他曾种过地，做过学徒、店员，亲历了旧社会百姓被迫被剥削的苦难生活，深重的压迫让他背井离乡到成都打工。中国时值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黑暗的年代，清政府的腐朽没落，列强的入侵，使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中。现实很快使王维舟明白，这不仅只是个人的命运多舛，而是国家和民族的灾难，这激发了他一生对黑暗社会的反抗。后来，他考入成都工兵学校半工半读，其间，他积极投身到四川的“保路运动”中。清政府血腥镇压了这次运动，他在脱险后，回到家乡东乡县(宣汉)组织青年“义军”，举行了武装起义，以实际行动投身于辛亥革命洪流中。

清政府倒台之后，王维舟曾任“靖国军”营长、团长等职，率部进行了反袁护法斗争。每驻军一处，他严格戒训部属官兵，要求不抽丁、不拉夫、不扰民，深得民心，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至今在宣汉县还依然保留着当年老百姓为王维舟树立起的“除暴安民”、“兆民赖之”等德政碑，表达了对他的崇敬之意。但是旧时军队内部勾心斗角，争地夺利，战事不断，导致百姓生灵涂炭，连年遭殃，这使他一心为民的理想彻底破灭了。他毅然弃官出走，奔赴上海，坚信一定能找到一条真正的救国救民之路。

在上海，王维舟结识了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金笠同志，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由此坚定了一生的信仰和追求。1920年5月经金笠介绍，王维舟加入旅华朝鲜共产主义组织，同年赴苏联学习。当时，年轻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正遭受14个帝国主义国家军队的联合进攻，其国内物质条件极度匮乏，食品短缺，每人每天只能保障半磅黑面包。王维舟和其他同学一起，积极响应列宁“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号召，经常忍受着饥饿参加义务劳动，以支援前线和红军。在苏联国庆节那天，王维舟和他的学友们一同参加了红场的庆典活动，见到了革命导师列宁，并聆听了列宁生动的演讲，王维舟对此感受至深，终生难忘。

1921年，他怀着极大的革命热情启程回国。翌年与吴玉章同志在北京共同组织了赤心社，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募款救灾，支援苏维埃。1923年，王维舟回乡创办宏文小学，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培养革命青年。1925年，奉命去武汉工作。1927年，他参加毛泽东主持的湖北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听了毛泽东、彭湃关于农民运动的讲座，理解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任务。这是王维舟同志人生中最重要时刻，奠定了他为中国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坚实基础。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王维舟秘密潜回川东，在宣汉、达县、城口、万源、梁山、开江一带，发动人民群众反剥削反压迫，并与万源的李家俊、达县的唐伯壮、宣汉的雷玉书等革命先烈，成立川东红军游击队（游击队由两路组成），开展农村的武装斗争，他先后任副总指挥、总指挥。当第一路、第二路红军游击队被敌人疯狂镇压后，他又发动虎南、达县、南岳的农民起义，组织红军第三路游击队，在敌强我弱的白色恐怖环境里，扎根于群众之中，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开辟了威震一方的川东

游击根据地。1930年，“左”倾路线在党内占主导地位，王维舟不得不奉命率川东游击队攻打汉口，遭到重大挫折。失败后，王维舟率余部突围回到川东，总结教训，重组川东游击军；不断吸纳有觉悟的青年农民，壮大队伍，游击军由此发展到上万人，使革命的星星之火在川东重新燃起；为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朱德同志曾在1943年6月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就此撰文说：这一切努力，“为红四方面军主力入川，并迅速扩大，做出重大贡献。”

1933年秋，宣达战役中，川东游击军配合红四方面军一举解放了宣汉、达县、万源。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33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委。红33军随后参加了历时10个月的反六路围攻战役，东征万源、城口，击溃反动地方武装，使当时的川陕根据地向东扩展百余里。正当川陕根据地保卫战空前激烈的关头，张国焘推行“左倾路线”，致使肃反扩大化，给红33军造成了重大的人员损失，许多革命同志遭到拘禁审查。15岁参加红33军、时任295团书记(秘书)的王定烈也在其中。在危急时刻，王维舟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到295团处理问题，看到发生的情况非常痛心。他本着顾全大局、维护团结、保护干部以及稳定部队的原则，经过认真仔细的甄别了解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在全体大会上公开宣布释放被拘禁的干部战士，同时撤掉了该团政委的职务，及时保护了一批宝贵的革命中坚力量。但是，“肃反”还是波及到王维舟等红33军领导人的头上，军长王维舟和政委杨克明被先后撤离了领导岗位。

王维舟被调至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工作，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忠于职守，在红四方面军内同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错误路线斗争，坚定地站在朱德等同志一边，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并随左路军行动，三过雪山草地，历经艰难险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持真理的坚定信念。1943年西北高干会议上，毛主席亲笔书赠他“忠心耿耿，为党为国”。

1937年8月起，王维舟任八路军129师原385旅副旅长、旅长兼政委，率旅直并一个团编入八路军后方留守处，驻守陇东，执行红四方面委开陕甘边区的任务。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进行和谈后，党中央决定吴玉章和王维舟担任四川省委书记和副书记，王维舟携家人赴重庆工作。在中共中央决定四川省委公开活动后，蒋介石获知了王维舟回川的消息。蒋介石对这个早年参加辛亥革命，熟悉川军将领，有着丰富游击战争经验，拥有深厚群众基础的老军人重返故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惶恐不安。一天，重庆市长、代行营主任张笃伦以请客吃饭为名，把吴玉章和王维舟请到他家传达了蒋介石的旨意：限王维舟三日出川，否则逮捕拘禁，限制其自由。张还说：王维舟是专门搞兵变暴动的专家。显然国民党对王维舟是又恨又怕，深怕他以共产党的身份进入当地的势力构成威胁。于是，国民党便找借口，匆匆派飞机将王维舟一家送往南京，后由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协调，王维舟一家才得以转机，安全回到延安。

解放战争时期，王维舟同志先后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协助贺龙同志参加了保卫延安、消灭胡宗南、收复延安等重大战役。全国解放后，王维舟同志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并兼任西南民族学院院长。1956年奉调进京，长期担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他是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七大中央候补委员、八大中央委员。“文革”时期他已是高龄老人，为保护老同志遭到诬陷打击，

黑暗中，跃出生命的高度——记盲人跳远运动员、残奥会冠军李端

本报记者 孟海鹰
看到李端，很容易想起小草。野火、寒冬……历经淬炼，生生不息，迎风而歌。2004年，雅典残奥会，李端夺得男子F11级跳远和三级跳远两枚金牌，实现了“听到国歌声”的心愿，在颁奖台上忘情地和着旋律高唱国歌。今天，正在积极备战北京残奥会的李端希望“能再次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奏响，能再次深情地在北京高唱国歌”。

失去了光明，灵魂不能坠入黑暗；看不见道路，脚步不能停滞不前

出生在吉林省长春市的李端，5岁开始打篮球，17岁荣获全国青年男篮比赛扣篮冠军。“那时的梦想就是成为中国的迈克尔·乔丹。”身高1.92米的李端说。

1996年，在打扫卫生时，一个底部几乎完全锈蚀的灭火器意外爆炸，致使李端双目失明。那一年，他19岁。

“曾想过不活了。”李端说，“那时，同院

综合——回忆王维舟同志

向守志 李中权 王定烈 王定国 王新兰

（二）

王维舟同志无论担当什么职务，都永远记得自己是人民的儿子，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1942年6月2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朱总司令祝王维舟56寿辰一文，该文中指出：“王维舟完全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儿子和学生，而群众却把他当作保姆和先生。”朱总司令号召：“他应该值得我们全党来学习和尊敬，值得全边区、全中国人民来尊敬。”这些评价，代表着中央领导对王维舟同志一生革命实践的肯定和褒奖。

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陇东的人民群众中，流传着八路军的干部中有个“马青天”和“王善人”。“马青天”是指陇东分区专员马锡五(电影、戏剧《刘巧儿》里面那个专员是个好领导，说的就是马锡五)。“王善人”就是指驻守陇东的八路军385旅旅长兼政委王维舟同志。

1939年6月的一天，王维舟与警卫员李有义，帮助旅部炊事班下河挑水，走到城墙边看到一位妇女带着小孩在挖墙皮，小孩嘴巴已经糊满了土。上前一问，才知道他们挖的是一种含有少量盐分的“白板土”，陕北农民在饥荒之年常用它来充饥。经了解这位妇女的丈夫叫史华，是村里的民兵营长，去延安学习一段时间，剩下她带着孩子租种土地。赶上年景不好，交完租后，家里粮食所剩无几，只好采摘榆树叶子和挖“白板土”补充。王维舟看到这种情景心痛不已，把母子俩带回自己家中，让夫人马奎宣去食堂打饭给他们吃，又找出自己孩子的衣服，交给娘俩。王维舟知道，解决一顿饭并不能解决这个家庭的饥荒问题，于是亲自给马锡五写了一张纸条，提出建议：请专署(政府)给这位妇女解决五斗粮和一些救济款，以度粮荒。并责成警卫员小李带着母子俩去专署的相关部门落实。出了大门那位妇女问小李：“外地口音的大个子姓啥?是八路军啥官?”小李告诉她：大个子是我们王旅长。那位妇女“哎呀”一声：“老天爷睁眼了，八路军当官的是大善人。”从此“大善人”的名声就在群众中传开了，在庆阳城方圆百十里，人们都知道，八路军干部里有个“王善人”，只要是百姓的事，他都会放在心上。

1942年，有位老大娘到了385旅司令部，要找“王善人”看病。哨兵挡住她，告诉大娘：“王善人”是旅长，不是医生。王维舟知道后亲自出来见她，得知她得了一种陕北叫“瘰癧瓜”的病，即缺血引起的大脖子病，她把这位素不相识的老大娘送到庆阳城外385旅的医院。在当时的诊疗技术条件下，医生认为老大娘需要手术，但陕甘宁边区受到封锁，医疗条件非常困难，旅医院没有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于是，王维舟专门向延安党中央发了电报，请求帮助治疗老大娘的病。不久延安派来了两位专职的外科大夫，为大姐做了手术，使其很快痊愈。陇东的百姓奔走相告，传诵着八路军救民解困、为百姓谋福利的故事，以至于百姓烧香拜神时，都要祈祷八路军打胜仗，祈祷共产党一定要得天下。

有一次，王维舟在路过新堡村时，碰到一位中年男子在路旁痛哭。经过询问得知，这位农民辛辛苦苦种了10亩西瓜，一夜之间，已经挂着小西瓜的瓜秧，不知被何人扯得乱七八槽，眼看着他一家大小指望着生存的西瓜地，被糟蹋成这样，他悲痛欲绝。王维舟了解了情况后，亲自到区政府替民告状，并指示一定要查清、处理。一个月后，王维舟专门到新堡区政府追问此事的处理结果，获知圆满解决才放心。作为陇东党政军领导王维舟、马锡五，

坚持秉公办事，对地方上出现的违法违纪事件，不论大小，一抓到底。他们认为，当官就要管违法的人、管违法的事，就要替民做主、惩恶扬善，让百姓真正感受到，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为政作风就是说到做到。

建国后，王维舟不论是在西南局担任重要职务，还是在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任常委，他一贯体恤民众、坚持党员必须廉洁为公的思想和作风，在工作中依然处处得到体现。1958年，党内出现了浮夸风，各地瞒报、虚报的情况抬头。王维舟虽已年过七旬，仍然坚持深入实地了解国情、民情，每到一地，对虚报、瞒报的浮夸现象公开进行严肃批评。他毫不隐瞒地说：搞浮夸的干部“不是马克思主义，是牛克思。靠吹牛是吹不出社会主义的!”回京后，他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正式提交工作报告，建议对那些靠说假话上来、并劝说不改的干部，给予纪律处分，严重的予以撤职。

1963年，王维舟已经是76岁高龄的老人，作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常委，王老要求参加四川省召开的检察工作会议，希望到会去落实中央7000人大会精神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系列指示。他到川东视察，沿途调查访问，在听到群众反映，因自然灾害的影响，生活困难，有人饿死的情况时，他难过得流下眼泪。在宣汉县18天的明察暗访中，召开了各种座谈会、调查会，接待了上访群众100余人，收到来信150件，查出了时任县委确实存在问题，并主动与四川省委沟通情况，撤销了时任宣汉县县委书记的职务。同时，主持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还给学生、机关干部上党课、作报告七次，宣传党中央的政策、指示。在解决干部问题的同时，他及时向中央打报告，申请给受灾较重的宣汉县百姓每人每天增加二两粮，以帮助渡过眼下的困难。直到今天，宣汉县六七十岁的老人们，一说起三年困难时期王维舟回乡调研心系百姓的事，便感慨万千。

王维舟同志戎马一生，始终对人民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情，耐心倾听群众的意见，实事求是地向中央反映情况，解决群众急需解决的问题。他鄙视看风向、揣摩上级、做表面文章的干部，他说让这种私人严重的人捞取了官位，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三）

王维舟同志一贯尊重少数民族，熟悉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和特点，早在1935年长征途中，他就被派任为先遣部队指挥员与少数民族打交道。红四方面军过草地前，四方面军供给部长吴先恩同志负责筹集红军粮草。一天他与王维舟同志率警卫人员前往一藏族寺庙，准备拜访主持寺庙的活佛，在离寺庙很远的路上，就看到一些藏族同胞一步一磕头，去寺庙朝圣。王维舟与吴先恩立刻下马，率警卫人员，按照民族习俗，向着寺庙磕行。就这样几百米出去，他们个个都汗流浹背，气喘吁吁，沿途的藏民对此情景很是震惊和感动。快到寺庙时，大活佛立刻迎了出来，看到领头的红军大个子王维舟同志年纪很大了，猜想一定是个大官，但是仍以民族宗教的方式拜访寺庙，亲眼见证了红军将领对藏民是如此平等相待，如此尊重藏族的宗教习俗，感动得不得了，立刻吩咐藏民们为红军筹集粮草。

西南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约占全国一半以上。解放初期，民族之间的隔阂现象很严重，这其中有些有历代民族压迫造成的民族摩擦，也有解放前阶级压迫留下来的民族裂痕，民族工作复杂而艰难。刘伯承、邓小平等主要领导曾经亲自部署调查研究西南地区民族情况，把民族工作摆在很重要的位置上。1950年王维舟同志出任西南局常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

席，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兼西南民族学院院长等职务，亲临民族工作的一线。

王维舟同志热爱百姓，热爱少数民族，他对少数民族有深厚的感情。他主持西南地区民族工作的几年中，在少数民族干部里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事事为少数民族利益着想，特别关心那些贫困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凡少数民族代表团，或民族上层出来参观、学习，不分他们是上层人士还是普通百姓，不论他们使用什么语言，不管他们保持什么样的生活习惯，王维舟都平等对待，一意见，倾听他们的意见，耐心与他们交谈，细心而详尽地讲解党的民族政策。王维舟同志从民族团结共同繁荣需要建设队伍的角度考虑，积极鼎力对民族干部的培养和教育，亲自筹措并创办了贵州、云南、西南三个民族学院，从规划设计、选址、经费、征地、基建、干部、师资、设备、课程设置等每一个环节，他都参与和检查，直至学院建成。西南民族学院经常为藏族、彝族中的活佛，土司头领，上层人士等办学习班，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王维舟抓住时机，与他们广泛结交朋友，建立友情，将党的民族团结、民族进步的方针，逐一地讲解到他们的心里。1951年，65岁的王维舟，为筹办西南民族学院往返于重庆、成都之间，也常常住在学院里帮助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困难很多，但王维舟力求涉及到培养民族干部的每一项工作都要做好，因此，从师生的住宿到食堂伙食他都亲自过问。50年代，西南民族学院的少数民族学生有一种习惯性的感觉，凡是听到空中飞机声，就会说：“王老来了，我们的问题好解决了。”此种现象在王维舟调到北京数年后，仍然存在。

1956年大区撤销，王维舟同志调到北京后，曾几次向周恩来总理提出辞去西南民族学院院长的职务，但周总理都没有同意，勉励他继续兼任此职。他遵照周总理指示，一直关注着西南少数民族工作，关心西南民族学院的建设和发展，直到1970年病逝。西南三省和西藏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干部们称他为“少数民族的贴心人”、“大善人”，许多当年曾得到王维舟教诲的藏族、彝族上层人士和现已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从西南走出来的少数民族干部，回忆往事，无不流露出对王维舟同志深深的感激之情。

（四）

王维舟同志一生对党赤胆忠心，刚正廉洁，从不把个人利害得失放在心上；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严以律己，关爱部下，从不以职权权重为家人或亲属谋利。

1935年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开始了长征，川陕苏区的很多红军家属跟着红军队伍行进。王维舟同志的亲属及家族大约有20多人也参加了长征，年龄最小的是他的侄女王新兰同志，出发时才10岁，最大的是其夫人马奎宣同志的妈妈，已经年过50了(并且是小脚)。与所有的红军战士一样，王维舟和他参加长征的所有亲属，跟着红四方面军长征，一路三过雪山草地，历经千难万险，没有一个人退缩，坚持到达了延安。后由于其岳母年龄大，没有文化，不愿拖累组织，又返回四川老家。解放后，她老人家一直在家乡靠劳动自谋生活，即便是王维舟任西南大区主要领导干部时，也没有要求县里对这位亲人有什么特殊的照顾。

李中权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东北野战军九纵政委（九纵后改为46军），司令员是詹才芳同志，王维舟的侄子王波担任该纵队师参谋长，军参谋处长。王波

是1925年入团，1928年入党，当年在红33军担任99师师长兼政委时，李中权同志在33军当团政委。李中权同志对王波在九纵里的职务过低心里不安，一次碰到王维舟同志商量要调整王波的职务。王维舟对李中权说：“王波在部队干什么都一样，还有很多优秀的同志都牺牲了。”

“文革”开始后，王维舟已年近80，但“四人帮”仍以莫须有的罪名迫害他，造反派抄了他的家，不许他自由活动，这对王老的精神健康损害很大，但他不顾个人安危，仍尽力保护一些老同志。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被迫反派揪斗追逐，有家不能归，曾数次住在王维舟的家中，王老让老伴和儿子给肖华擦拭血迹，用药热敷伤口。总政副主任傅钟为摆脱造反派的纠缠，带着警卫员在王维舟家秘密躲藏了近一个月。李中权同志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和政治迫害，1967年11月到北长街王维舟家，向老领导诉说自己的不幸。王维舟一方面鼓励李中权要有更坏的思想准备，不光是接受考验，还要注意保护自己；一方面叫夫人马奎宣同志详细记下李中权的履历，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出面澄清事实。1975年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大批干部开始逐渐获得“解放”，李中权在北京军区空军被挂起来，没有解放，没有工作。此时王老已经去世5年了，马奎宣同志依旧铭记着王老的嘱托，惦记着李中权的情况。她四处找当年四川达县、宣汉县籍四方面军的老同志，为李中权证明。在马奎宣同志的积极努力和原四方面军很多老同志的协助下，空军政治部先后派人调查访问了张爱萍、王直哲、李开芬等同志，为李中权同志当年革命的表现做出了证明，澄清了事实，使李中权很快恢复了党籍，获得了解放。

王维舟的夫人马奎宣同志是参加长征老红军干部，其职务和级别比同期参加革命的同志要低很多，有同志曾建议王维舟向有关部门提出来，但他说：“不能向组织伸手，比起那些牺牲的革命先烈，我们已经很知足了。”王维舟去世后，全家从原来住的四合院，搬到一套只有三间住房的公寓，一直住到前几年她病逝。由于马奎宣同志的工资很低，子女多，生活一直拮据，但她带着孩子们始终坚守着不向组织伸手，不求特殊照顾、艰苦奋斗，甘于清贫。她去世后，子女们依然遵循着父亲生前的教诲，勤恳工作，认真办事，清白做人。

王维舟在我们党内、军内属于资历老、年龄大的老一代革命家，他与党内外、军内外许多同志和爱国人士建立有很深的友情，与党内著名的“五老”(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等同志)之间，更有着半个多世纪的情谊。董老曾这样赋诗于他，书怀他们的革命之交、生死之交：“廿纪生经大半稞，吾华革命典型垂。与君先后共奔走，顾盼红旗合春颐。”“文革”期间，谢老已半身不遂，听说王维舟的家被抄，他专门要身边人架着他去，到王维舟家去看望。在艰难的时刻，他们互相守望，相互勉励，坚信共产党人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百折不挠，坚信中国共产党必将能战胜各种险风恶浪，取得最后的胜利。

王维舟同志历经坎坷、风风雨雨的一生，锻造出他对党赤胆忠心，坚忍不拔。在对敌斗争中，勇敢善战，将生死置之度外，令军阀和反动势力闻风丧胆；对人民群众则倾心关注，心系百姓冷暖，思想感情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和尊敬。他坚持讲真话，做实事，廉洁自律，淡薄功名。王老一身正气，品格高尚，他的人格魅力可与星河皓月同辉，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参考文献：

1.本文(一)部分，主要依据：中央党史办；七大党代表名录“王维舟简历”和王维舟1961年9月“我的回忆”一文。

2.本文(二)、(四)部分，参考：宣汉县党史委员会编印的《王维舟》一书中李中权、王定烈、李有义、王荒原等人的文章，以及宣汉县党史委员会编印的《王维舟传》。

3.本文(三)部分，参考：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西南民族学院史》(1951—1991)一书。

中国外文局和美国耶鲁大学获颁美国休战基金会拓展奖

据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记者魏武）为表彰中国外文局和美国耶鲁大学在大型出版项目《中国文化与文明》中所作的贡献，美国休战基金会10日在北京举行仪式，向中国外文局和耶鲁大学颁发拓展奖。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兼中国外文局局长蔡名照代表中方、美国耶鲁大学校长雷文代表美方共同出席了颁奖仪式，并接受颁奖。包括萨马兰奇在内的国际奥委会和美国奥委会的高级官员、运动员代表等125人出席了颁奖活动。

美国休战基金会认为，中国外文局和耶鲁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文化与文明》项目在展示多彩的中国文明时，克服了来自文化、商业、政治、学术、语言等方面的障碍，在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推动中美两国增进交流、理解和信任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正是奥林匹克休战的精髓。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向两者颁奖，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中国文化与文明》项目开始于1990年，是迄今为止中美之间最大的合作出版活动，在中美两国获得国家图书大奖。

“奥林匹克休战”是国际奥委会根据古希腊“神圣休战”精神倡导的一项和平运动。1993年，联合国通过决议，呼吁各成员国在每届奥运会开亲和闭幕前后各一周以及奥运会期间，遵守奥林匹克休战的协定。

用心感受生命的温度，用精神跃出生命的高度

“奥运会比完了是逗号，残奥会比完了是惊叹号。当一个人只有一条腿，还在奋力向前比，坐在轮椅上还在向前冲，这不仅仅是一次比赛，更是一种精神。”李端希望有更多人关注残奥会，为残奥队员喝彩加油。

残奥会结束后，李端希望能去地震灾区，“讲一讲我们的故事。因为我们是来自悲痛中走出的人，更能与其感同身受。带给他们希望与鼓舞。”这些年，李端也不记得曾有多少人问他如何从打击中坚强地站立起来。

李端说，生命的温度更在于自己去感受，即使是有残疾。正如一句台词所说，我看不见了，这是红颜色的玫瑰吗，可真香啊！在延吉传递火炬时，大雨中，我看不见火炬，可是我能感受到它的温暖。就像我和教练在训练中的一次对话一样：

“阳光照到我的脚了吧？”

“是啊，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感受到了它的温度。”

跳远时，李端需要起跳十二步，且必须在直线上，每天都在不断重复练习。一步、两步、三步……十二步，然后奋力向前方一跃——在一片黑暗中，每一跃都为他的生命撑起了一个美丽的高度。

完美的双人舞。

心中亮堂，也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现在，失明的李端很是自立。“李端擀的饺子皮可好了。家里的凳子坏了，水管坏了，都他修。发短信，玩电脑都会。”李妈妈欣慰地说。

李端说，在盲校，他接触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得到了许多温暖、关怀与鼓励。“他们是这样自立自强，从他们身上我感觉到没有干不成的事，全看你是否努力。”

“最冷时，春天快来了。最热时，凉快天快到了，大自然的规律就是这样。有健全人就有人，就像有男人就有女人一样。”李端说，当他从心里接受既成事实时，一切便不再那么难了。

认识李端的人，往往都被他乐观向上的精神所感染。他鼓励自己，“我李端是前途无量（亮）啊！”调侃后是快乐的自嘲，自嘲后是最有底气的自信。妻子戚彦英说，和李端在一起就是特别快乐。